

# 危机中的调停：韦勒克的语文学省思、比较文学设想与人文主义理念

郭西安

**内容提要** 韦勒克在《比较文学危机》中的批判折射了整个欧美的文学研究在战后转型期陷入的多重困境。以语文学为典型的欧洲学术旧范式推助了实证主义、历史相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忧患，韦勒克对此采取省思和超离的姿态，投身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其设想体现出在各种对峙观念之间斡旋调停的策略，寄托着审美批评人文主义的理念，试图用艺术的无功利性审美价值来抵抗世界的风云突变和民族主义的暴力，但这一方案也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吊诡。韦勒克推动比较文学从世界主义理想的应和转向对传统的文学界定参数进行反思和辩夺的世界文学研究，此后有关比较文学学科的讨论更显明地围绕民族与世界、地方与普世、文学与非文学等范畴的纠缠竞合关系展开。

**关键词** 韦勒克；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语文学；人文主义；世界文学

韦勒克被认为是二战之后西方人文学科高速发展的三十年间文学研究领域最为权威的学者之一，正如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霍奎斯特所说，他是一个特定文学学科的时代象征，任何理解文学研究这一职业现状及来路的负责任的尝试，都必须将他纳入考量，就此而言，韦勒克永不过时<sup>[1]</sup>。从中国学者的熟识度而言，除其最负盛名的《文学理论》之外，韦勒克的另一大功绩恐怕就是1958年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以下简称“《危机》”）的报告了，此文通常被学界认为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崛起和学科范式转型的标志。韦勒克认为有三大弊端致使比较文学陷入危机：对研究内容和方法的人为划界，有关渊源和影响的机械观念，以及文学研究受制于文化民族主义的动机；相应地，他提出坚持文学整体研究、回到“文学性”并以此克服民族主义的对策<sup>[2]</sup>。有关这一檄文已有诸多解读<sup>[3]</sup>，然而，《危机》中仍有两点疑虑悬而未决：其一，韦勒克从未提出学派之说，相反，他多次表示自己深受“在假定的美国和法国比较文学观念间制造争端”的困扰<sup>[4]</sup>；其二，文中并未过多讨论比较文学的具体改革，而是

迅速提出有关文学的“一体性学科”，不受语言限制，不分国别和时段，这就实际消弭了比较文学自身的学科建设，指向文学研究在人文科系中的总体调整<sup>[5]</sup>。对此，学界一般以交互引证的思路来处理：韦勒克主张文学整体研究，所以并未提出学派论，反之，不讲学派正好印证他对文学整体论的坚持。这类循环解释未能澄明其对比较文学的正面设想和内在理路，反倒使得韦勒克留给我们一种奇怪的印象，即他在比较文学学科史上那种尖锐批判、扭转乾坤的形象是异常鲜明的，但他对学科改革的具体建言却显得极为概略甚至流于含混。

本文无意就韦勒克的学术研究做总体论述，而是试图阐明，如将“危机论”放置回彼时比较文学乃至欧美人文研究的具体语境，联系韦勒克个人的经历与学脉，将会发现，与其比较文学理念密切相关的一条隐形线索是他对欧洲语文学传统的态度和人文主义规划。对韦勒克的比较文学、语文学与人文主义三理念作出关联性考察，有助于我们纳入其诸多重要论述建立互文分析，批判性厘清比较文学“危机论”的内在逻辑和学科建制设想，也由此窥知韦勒克所处之战后流散动荡

的欧美文化境况，以及他作为移民知识分子所做出的独特选择。

### 一 从欧洲到美国： 隐秘的参照与交叠的危机

众所周知，韦勒克在《文学理论》里提出了他最核心的学术理念：文学研究整体观，即文学研究应当覆盖全部的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是知识、洞见与判断都在发展着的一个体系<sup>[6]</sup>。正是基于此，他指出，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无法被孤立地研究，而要放置在文学传统和文明语境中，带以文学理论的总体问题意识加以描述和评估，这一过程中，“比较”必然具有基础的与核心的认识论功能：“在这个基本的意义上，所有的文学研究都是比较的”<sup>[7]</sup>。故而，尽管都指向文学的整体性，但相比“总体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两个类似的名称，比较文学“是更好的术语，更少歧义”<sup>[8]</sup>，换言之，“（比较文学）就是文学总体的研究，是文学研究的综合”<sup>[9]</sup>。韦勒克认为，在历史上，“语文学”曾是最接近文学体系意涵的话语之一，但已然饱含争议、不合时宜<sup>[10]</sup>。这意味着，惟有比较文学堪能代之成为承载文学整体研究的学术话语。1983年，已经80岁的韦勒克从另一角度回应了这一期许：“比较文学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即打破旧语文学的藩篱，重新建立起一种国际文学研究的理念与理想。”<sup>[11]</sup>

上述线索表明，韦勒克的比较文学观念必须放置在欧洲语文学传统的关联参照系中加以理解。1953年，韦勒克受邀对战后美国文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做综评<sup>[12]</sup>，正是从欧美各地对德国语文学传统的接纳和反叛来切入论述。作为欧洲现代人语文学科体系中具有统摄性组织力量的主导范式，语文学尽管在文艺复兴之后更多限于古代文献与文化，但随其方法和理念逐步辐及中世纪与现代，从最广泛意义上与一般语言和文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一度成为研究各种文明的普适性科学。在此过程中，德国浪漫派的先驱们起到了极其关键的推动和形塑作用，以赫尔德的学说为典型，浪漫主义语文学发展出了一套有关普遍共享的语言—思维—民族紧密关联体及进化论的生物—社会学解释模式。这脉思想与方

法当然为人文研究带来了巨大的革命性效应，但在韦勒克看来，随着对语文学话语的诸种滥用，其原本极富价值的理想陷入衰落，文学研究最初的人文观念和目标被长久地遗忘了<sup>[13]</sup>。早期语文学原本就混杂着意识形态理念与实证科学方法两股力量，到19世纪下半叶，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两脉取向逐步凸显：浪漫主义隐含的民族主义立场以更精致且更稳固的方式输出，实证理性则日渐僵化甚而演变成狂热的唯事实论和唯科学论，二者合力促发了文学研究中一系列语文学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分离<sup>[14]</sup>。

韦勒克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典型体现在作为文学研究主导的文学史模式中：德国浪漫派为了对抗法国和拉丁传统的霸权，以重构文学史来支持其“民族性”的塑造，他们征用并推助了“唯事实主义”的考据佐证式思路，文学史倾化为文化史和社会史；当浪漫主义失去其信用，自然科学带来的“唯科学主义”又涌现出来，与进化论观念相结合诉诸一种有发展规律可循的文学史。上述理路隐含着渊源逻辑的迷信，并制造了多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悖论：越是强调民族文化的多异性，就越使得民族的内部视角得以巩固和优先保护，越导向文化价值等级的竞争冲动。于是，文学史研究的民族主义不仅没有被超越，反倒由“事实”和“科学”粉饰得更为隐蔽复杂、也更具备推广的力量了<sup>[15]</sup>。

文学研究在彼时的民族观、历史观和科学观的协同限制下处于压抑与拉锯的态势，此种境况乃是整个欧洲的总体趋势，进而，“美国自身的文化境遇加剧了这一衰落”：一方面，作为德国学术重要内驱力的日耳曼种族根基是美国这样的新教国家所缺乏的，后者也很难体察和真正建立起类似的民族主义动机；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具有欧洲国家深厚复杂的历史地理联结，在文化上实际更为孤立，“更容易陷入时空上的地方主义”<sup>[16]</sup>。于是，美国对德国—欧洲学术范式的继承模仿只能是技术层面的，对多种文学传统的研究受制于语言学习和文学传统自身所属的方法和评判体系，使得美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停留于邯郸学步<sup>[17]</sup>。美国的学者也认识到这一艰难的处境，掀起了面向语文学范式的多种反叛运动，但在韦勒克看来，作为人文研究支柱的语文学崩塌之后，所有局部的抵抗都不足以成为替

代的系统性方案，文学研究仍深陷于琐碎、汗漫与空洞之中<sup>[18]</sup>。如此，通过叙述语文学精神的衰落及文学界的诸种试炼，韦勒克实际上勾勒出了彼时文学研究的总体困境与相应的改革诉求。

这种欧美学界共享的危机意识与改革诉求在韦勒克和沃伦联合署名的《研究院的文学研究：诊断与处方》（以下简称《处方》）一文中被更为明晰地陈示。该文就两次世界大战间英、德、法、俄和美国本土的高等文学教育基本境况分别作出评述，指出西欧各地的文学研究与教育均各自存在时弊而失序，亟待一套新的系统性理念加以整饬<sup>[19]</sup>。从题目上，这很难不让我们联想到《危机》的修辞：“crisis”本指病程中的关键转折点<sup>[20]</sup>，和此文的“诊断与处方”正相呼应。而在尖锐的综评之后，文章毫不意外地使用了“危机”这一表述：“（文学研究）这一职业的危机不能归咎于学术、或是一个职业不可避免的专业技术性引来的外界嘲弄，毋宁说，我们必须正视文学研究者的特定处境，我们相信这个职业是可以从内部疗救的。”<sup>[21]</sup>

文章给出的疗救方案待后文详述，此刻我们已经很容易注意到，当韦勒克在《危机》中指出比较文学的三种弊病时，他并不是在概括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界的思想和方法，甚至不是限指比较文学自身。显然，韦勒克对当时比较文学、语文学范式和文学研究整体的批判之处是高度交叠的，而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文学研究的对象、方法与意义的激烈协商之中聚焦了诸种原则性问题，因此，《危机》是以比较文学为入径和典型，折射整个欧美的文学研究界在时代转型期所陷入的多重危机：这既是韦勒克亲历的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留下的严重创痛，也是他与之有着千丝万缕密切关联的旧学术范式在新时代激荡下的延烧与困局；相应地，对比较文学的新的建设也不仅意味着帮助学科走出危机，更是承载着整个文学研究的前景。

## 二 斡旋而执中：

### 语文学的遗存忧患与比较文学的建制设想

同为战后流亡知识分子，韦勒克的名字往往与奥尔巴赫和斯皮策相并置，但与两位罗曼语文学家

不同，他并未选择在美国延续欧洲语文学的范式，而是多次表达出上文所述的抵抗与批判，也对二人的语文学工作开展深刻的省思<sup>[22]</sup>。

为了抗击那种无视无知于欧洲复杂纠葛的历史事实而施展的种族主义——其极致就是第三帝国的暴行，奥尔巴赫求诸语文学，号召悬置“主观的”批评和概念，投身于思想史具体过程及复杂联动的“深描”，以“历史透视主义”抵达纵深的历史文化现实，《摹仿论》即是此一信念的典型体现。然而，形成历史的那种距离化、客体化的投射总是主体从当下有限的际遇中发出的<sup>[23]</sup>，当作为终极依据而永远在场的神学信仰瓦解之后，“历史”并不能代之而承担起其所声称的中立且综合的重负。

于是，韦勒克尖锐地指出，《摹仿论》所投注的历史主义理念并不具有自明的客观性，而是为少数精英、尤其是德国学者所推崇的特定信条<sup>[24]</sup>，其后果是，一切发生了的历史都成为黑格尔式历史精神的合理展开，学者所做的就只能是对过去尽可能全面、深入的同情地理解，其所忽视和压抑的力量，来自文学中那些不屈于历史暴力裹挟而与之倔强争持的存在主义表达。韦勒克认为，沉迷于过程性细节的语文学无法真正对抗那些裹挟在历史合理性包装之下的深层欺瞒与野蛮，反倒损耗了文学的价值：那些独特而伟大的作品深深吸引和鼓舞着数代读者之处，并不在于其历史性的一面，而在于其抵抗历史的一面。奥尔巴赫过度强调对过去的移情，这使得他不可避免地滑向“折中主义、纯粹的复古主义，最终成为极端的相对主义而失去批判力”<sup>[25]</sup>。

而在悼念斯皮策的长文中，韦勒克深为赞同的正是那种对批评介入和美学价值的重视，但对其语文学实践也仍抱有保留态度。在种种缺憾中，韦勒克显示，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斯皮策对待不同民族的文学有时呈现出的武断和抵牾绝非偶然，而是与其“罗曼语文学德国奠基者们的真正传人”这一身份认同有着深层的联系<sup>[26]</sup>。

斯皮策强调艺术作品的审美有机性，重视文学史和学术传统，这些无疑都是韦勒克所认同的，但斯皮策却是出于语文学观念的前提：“一切语文学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那就是世界上所

有的人基本都是一样的，当代批评家凭借训练和专注，可以接近或恢复另一个时空中创作出来的作品原‘意’。”韦勒克认为此乃“对意义单一性和我们可能获取这种意义的坚定主张”<sup>[27]</sup>，意味着经由语文学而跨越时空的能量同时隐藏着暴力。斯皮策晚年极力推崇作为德国浪漫主义语文学精粹的“人民”和“精神”等概念，他没能警觉到，这些概念支撑的是人为制造的民族神话，潜藏着从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推广至普世性这一危险的倾向<sup>[28]</sup>。

然则，除了作为激进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智识装置，语文学传统还有一重更为滞重的忧患是极难被觉知和消除的，那正是包括斯皮策、奥尔巴赫和韦勒克本人在内最为忧惧的民族主义。当德国浪漫派的语文学家强调依据具体的特征和变动来理解民族文化，而后者又作为普遍人性的具象表达时，他们确实试图同时对抗虚无的民族主义与相对主义，形成具体与普遍、地方与世界的平衡，但事实证明，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快就瓦解了。正如达姆罗什从赫尔德思想重要的发展者、比较语文学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格林等人那里看到，语文学在方法上是超越民族的，但投射的理念和欲望又往往是民族主义的<sup>[29]</sup>。以科学方法为加持，比较语文学、语言学和历史溯证相结合，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观念提供了学术基础。韦勒克觉察到，民族主义是欧洲传统中最复杂微妙的顽疾，美国不仅不能自外，反倒人为增强了对民族语言—文学—文化一体性的制度化建设。他在《文学理论》中就提出了这一观察：“19世纪将语言界限的重要性过分夸大了。……直至今日仍然产生着实际的影响，尤其在美国，表现为教授文学和教授语言其实是同一回事。”<sup>[30]</sup>

对韦勒克而言，文学并不等同于语言，文学研究也不能局限于音律、技法和修辞分析，在《危机》中，他说明自己“尽管向俄国形式主义学者和德国文体学家学习”，但仍然与之分道扬镳，这同样关联于其对文学研究“彻底的整全性”的主张，即认为艺术作品是“多样化的总体”，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符号结构”<sup>[31]</sup>。由是，韦勒克一再强调文学理论与评判无处不在，并且更注重在多元文学文化资源间进行比较、参鉴和审辨<sup>[32]</sup>。

在韦勒克对比较文学现状的洞察中，对语文学传统的超克构成了他隐秘但重要的语境，体现出其整顿文学总体研究的雄心。但必须注意，韦勒克对语文学绝非全盘否弃。他的耶鲁求职演讲同样全面分析了各种针对语文学范式的反叛和改革，但在讲演末尾提醒道：“这种反叛如果走向极端也是危险的”，因为“扎根于广博事实知识的坚实基础”同样必要，而这方面的贡献正来自于语文学<sup>[33]</sup>。显然，韦勒克希望语文学那种扎实、细致而博识的风格得以保留，但被限制于基本学识的技术性层面，他既担忧作为研究基石的那种语文学能力被矫枉过正，又意欲控制其历史相对主义、民族主义和实证主义要素的泛滥。

然则，韦勒克的文学研究理念就呈现为一种调停的方案：有关文学的综合性与整体性的理念分明投射着语文学传统所怀想的那种密实、丰饶和全面的诉求，但另一方面，又以关注文学符号系统的特性和功能为收束，圈定文学研究的相对边界与问题焦点。落实到体制建设中，承载这种兼顾“系统性”与“文学性”理想的学科正是比较文学。

我们可以从韦勒克和沃伦在《处方》的畅谈中厘出其设想的文学体制疗救方案。以英语系为例，一个英语文学博士不是主攻英美文学某个时段的专家，而是一位“专业的文人”，必须在英美文学之外还通晓文学理论、各种学术和批评，对语言的把握程度也要提升，并能在人类知识、思想和文明的整体结构中领受自己学科的位置，因此要能够从理论和历史上来理解该学科的“哲学”。将这种英语博士培养的推广到其他语言文学专业中，即形成立足国族语言文学教育的第一层级。进而，学生可以通过主修加辅修的方式拓展学识范围（如法语文学辅以英语文学），以便理解更广泛的欧洲文学并打破文化地方主义，此为从国族文学过渡到区域文学的第二层级<sup>[34]</sup>。改革的第三层级毫无悬念地指向比较文学：在前两者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全面系统的训练，以接近文学整一性的理想，比较文学的复兴“就是成为总体文学系，或国际文学系，或者就简单叫做文学系”<sup>[35]</sup>。

这样一种科系建设的内涵仍然过于宏阔，很容易面临浅薄或业余的指摘。对此二人辩护道：“那些成熟文学科系的专家经常会觉得，比较文学这种研究很容易就脱离了语言学、语文学和历史学的严酷

训练，但如果对复古主义的脱离可以由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严酷训练加以弥补，就没有任何问题。”<sup>[36]</sup>传统学科的训练被冠以“复古主义”之名固然是一种姿态，但此话透露出另一重要信息是，他们鲜明地强化了理论和批评在比较文学中的比重，并以此将比较文学学者和传统文学研究的专家区分开来。

在《危机》中，韦勒克明确推进了这一观点。当是时，比较文学的垦拓者们焦虑于本学科与既成文学体制的关系，“不能也不敢进犯其他的领地”，希望与国族文学学科系“互不相扰”<sup>[37]</sup>。韦勒克批驳道：“文学研究中没有所有权，也没有公认的‘特权阶级’。每个人都有权利研究任何问题。”<sup>[38]</sup>不惟反对文学建制的圈地自居，他更抨击专家主义的弊端，强调比较文学学者有自己的定位优势：“人们过于注重专家的‘权威’了，专家往往可能只是更熟悉文献资料或是一些外部信息，未必具有非专家的鉴赏力、感受力和知识面，而后者更广阔的视域和敏锐的洞见则可能很好地弥补缺乏多年精专式研究的不足。”<sup>[39]</sup>

在这种学科设想中，比较文学不仅象征着更为“灵活、博识与自由”的思想和研究<sup>[40]</sup>，而且处在整套体制改革方案的中央地位：比较文学重视系统教化、强调文学理论和批评史，还承担着培训教师的特殊任务，使其能够指导有关经典、人文学科和大文学的核心课程。一来，这与国族文学共同服务于综合一体的文学理想，“而非英语、法语或德语语文学”；二来还能促成更大范域的学术对话。当过去假想的主导宏大范式在新的智识体系中失效，专家们已难以就各自的前提与裁断发展出有效的抽象性来交流，比较文学对理论和批评的强调会使学生在逻辑学、认识论或符号学这样一些具有知识联结效力的层面得到充分训练，这种改革不仅对文学至为重要，还能在知识整体的子系统之间发挥作用，推动科学家、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者间的适度沟通<sup>[41]</sup>。二人认为，这种设计绝非模糊空洞的理想主义，它充分顾及了美国注重高效和实用的精神传统，完全是立足当下、切实可行的<sup>[42]</sup>。

上述建言究竟在何种程度得以贯彻有待另文考察，但韦勒克在彼时各种对峙观念之间斡旋而执中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在第二届美国比较文学大会

的发言里，韦勒克对这种以比较文学为中介的调停方案予以总结道：“我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在扩展与集中，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把文学作为艺术来研究与把文学置于历史社会之中来研究，这种种之间保持平衡。”<sup>[43]</sup>

### 三 超离或抵抗： 审美批评的人文主义及其吊诡

有意思的是，1965年的同一发言中，已为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韦勒克开篇便回顾当年教堂山会议的情形，表明自己当时并非作为“专业”投身比较文学的人士参会，但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对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的预设，及其导致的研究范围与人员构成上的原生性偏狭发出质疑”<sup>[44]</sup>。这一局外人的处境与其东欧流亡学者的特殊经历密切相关：辗转于德、英、美、斯拉夫等多重学术与文化氛围之间，韦勒克不仅身处主流欧洲比较文学共同体的外围，甚而并不属于任何一种学术团体，即使对自己最公开系于的布拉格学派也保持了距离。可以说，韦勒克几乎对所有学术传统都保持着超离（detached）而非归属（attached）的姿态<sup>[45]</sup>。

流亡知识分子在美国的比较文学建设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他们一方面热切盼望在这片新兴之地建立新的自我和共同体，另一方面又试图延续或重振滋养自己的欧洲人文主义传统，在很多移民学者身上都能见出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韦勒克在其中显得相当不同：正是对美国高度的文化适应力为他赢得了巨大的成功，主要就体现于他在那个时代对文学学科、尤其是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无出其右的贡献<sup>[46]</sup>。《处方》一文就指出：“很难想象重建欧洲文学研究，美国倒是有望转为新的领军力量”<sup>[47]</sup>，相比那些怀有乡愁的欧洲同行，韦勒克更注重观察和理解美国学术界的现状与潜能，乐于以建设性的姿态投身其本土的体制改革，正是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使得他出色地调用并转化了自己独特的多元文化经验，被赞誉为“欧洲和美国思想的调解人”<sup>[48]</sup>，“东欧理论家和美国学者之间的大使”<sup>[49]</sup>。

身处美国的韦勒克并不感到平静和满足，他非常清楚流亡的欧洲人所付出的代价，他同样清楚的

是，文学是发生在真切的历史政治语境下的，文学也无法回避其作为“民族性”塑造最重要的资源和手段这一角色，成为国族竞争的文化资本，这些都是不可否认且长久持存的事实。彼时知识界大力呼吁人文主义也正是为了抵御这些暴力现实的裹挟。比较文学诞生于对人类文明多异与变动的深刻省思之中，是对国际紧张局势、民族复杂张力作出的敏锐回应，人文主义自然是它建设的基本动力与核心命意<sup>[50]</sup>，而韦勒克的比较文学建制设想也寄托着他的人文主义理念的反思与改造。

在韦勒克看来，欧洲人文主义的语文学同情人的历史性境遇、强调民族文化的多异性，但诚如前述，它没能承担起抵御民族主义的重任，反而导向了为现实辩护的历史主义和强化差异对立的相对主义。在美国本土，一度盛行的艺术消亡论和文学功用说同样提示了人文主义被实用主义化的陷阱<sup>[51]</sup>。韦勒克疾呼回到文学艺术本身，要求研究者凭藉文艺来直面诸种暴力、给出评判和决择，但其评断成立的基本依托必须系于作品存在的客观结构本身，目的是规避个体带来的赋值偏见，以审美共通感的主体间性打造协商的基础和通道。韦勒克的计划是，用无功利的审美批评来抵抗世界的风云突变，当以事实和科学为表象的话语掩藏了特定但又强大的价值预设或霸权动机时，立足当下的文学批评要对之进行揭示和抨击；当动荡不安、因人而异的社会现实在争斗博弈时，文学和艺术要以相对独立且更具（潜在）共识力的美学价值与之抗衡，给人们另一种选择和安放的可能与指引。

由此，我们才得以理解，韦勒克在《危机》中提出比较文学的民族主义动机问题，直至全文行将结束之际才予以回应：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动机问题要靠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改革之后方可迎刃而解。韦勒克主张在审美批评中保留具体经验性的维度，由此达到主客观的辩证，对冲本质主义与相对主义。此时，作为一般批评智识实践的“比较”<sup>[52]</sup>，就被放置在联结具体与普世、历史与恒常的核心位置：可以通过比较辨明认识的差异、克服个体的偏狭、超离当下的立场，向文学所象征的“整全性”真理持续地靠近，这样，比较就不仅具有前文所及之认识论价值，而且被赋予了目的论的重

任。《危机》最后，韦勒克想象其计划的美好前景：诗与艺术“战胜人类的有限生命与无常命运，创造出想象的新世界，民族的那些虚念也会消失”，“一种普世的人……才会出现”<sup>[53]</sup>。他对比较文学的设想与此完全贯通，因蕴含具体而动态的跨越边界、趋近整体的意味，比较文学导向的正是综合一体的文学：“只有一个文学，正如只有一个艺术与人文：这一概念意味着文学研究的未来。”<sup>[54]</sup>这是韦勒克给出的人文主义方案，一种审美批评的人文主义。

遗憾而极富深意的是，韦勒克的这一方案也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吊诡。既然审美不可脱离具体的经验性，而所有批评都必然涉及特定的预设和观念体系，那么，一种不带任何偏见的审美旨趣、无功利的超离，究竟是怎么能够通过比较来实现的呢？这正是韦勒克必须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加以发展的艰难议题，但他几乎是存而不论地迅速就转向了具体的实践，仿佛只要具有相关的理念和学识，就自然能达成这种审美人文主义。然而，即便是韦勒克本人都往往显出名实不符，他在广泛讨论欧洲文学的各种传统和作品时，仍然以民族文学为坐标和叙述的基本单位。如果说《文学理论》是韦勒克文学整体观的纲领，那么他的学术实践则更像是多种欧洲国族文学批评的集合，其《近代文学批评史》便是显例。达姆罗什就对《危机》中那鼓舞人心的结语提出了批评，认为韦勒克表达了“双重的除根状态”，既要求作品脱离其起源，又要求读者脱离其当下社会，这种甘愿放弃的损失并不适用于大多数人，他还讽刺韦勒克对“普世的人”所操用的措辞都并不普世，而只是“男人”（man）<sup>[55]</sup>。

问题的关键出在韦勒克对国族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设想的层级关系。他已经认识到，“普世性的与国族性的文学互相牵涉”<sup>[56]</sup>，像欧洲那样具有内在关联的跨国族文学传统，本身就是普遍性与国族性的化合现象。那么，“比较文学就非但不意味着忽视具体的国族文学研究，事实上，国族性以及各国族对总体文学的独特贡献问题会成为比较文学的核心论题”<sup>[57]</sup>。这是韦勒克敏锐的洞见，但他提供的思路却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循环：要理解国族文学，就要理解国族所在的区域文学传统，而这又离不开对文学系统整体律则的把握，但

在理解了所有国族文学的特征之前，又怎能堪称把握适用于文学整体的共通律则呢？从理想上，这个计划变得如此庞大以至无限延异，而从实践上，“理论所承诺的更广阔的视角仍然主要产生于少数国家的文学”<sup>[58]</sup>，这无可避免地导致以特权区域文学产生的理论对“剩余世界”的文学开展治理。

这一构念与实践的悖论也破坏了韦勒克所想象的文学自治性。他将艺术作品的存在界定为“符号和意义的多层结构”，将文艺研究的首要任务定位于对艺术作品自身开展“内部研究”<sup>[59]</sup>，是将人类文化实践视为诸符号系统的集合体<sup>[60]</sup>。就文艺这一子系统而言，“艺术本质”或“文学性”必须被视为艺术作品的第一属性和根本规定。韦勒克试图通过声明现实生活与艺术作品之间具有“本体论的鸿沟”<sup>[61]</sup>来确保审美在文艺研究中的优先位置。但保护艺术自治不是为了艺术本身，而恰恰是基于现实的考量，这就使得文艺性的所谓“先验”前提仍无法脱离经验。保存艺术审美自治的“飞地”比韦勒克设想的要困难复杂得多，或是陷入形式主义的空想，或是演变为貌是情非的分裂<sup>[62]</sup>。

曾给韦勒克重要启示的索绪尔指出，语文学属于语言学史的第二个阶段：它并不专门处理语言问题，而是导向了对文献的历史、风俗、建制等方面的兴趣<sup>[63]</sup>。索绪尔承认，语文学有关“具有特定起源之特定民族”的民族志式关怀持续吸引着他，而这一点是语言学所不能容纳的<sup>[64]</sup>。韦勒克按照普通语言学的思路，提议为文学划定其专属的研究对象、发展出特有的术语与分析方式<sup>[65]</sup>，但他没能意识到，文学研究并不能照搬符号学—语言学的逻辑。正如苏源熙指出：当不同语言学家依赖同一套术语和概念来对话时，他们谈论的主要不是语料库或语言史，而是相对抽象出来的语言系统框架或语法；然而，比较文学无法脱离具体的作品及其历史语境和文学文化体系来对话，文学研究从未达成、也难以想象它可以达成现代语言学那样的通用理论语言。如果试图从具体的文学传统和实践中抽象出某种通用语法或系统规则，以运用于更为广泛的文学现象，这种研究正会导向比较文学最大的敌人，即文化沙文主义<sup>[66]</sup>。

如果“文学性”产生于更大系统内与其他话语

序列的参照比对，那么“文学”就必然处于具体的话语协商中，而不应被设想为一个理念上的整体。学术史也表明，语文学关心语言及文献各种层级的特征和语境，牵及国族文化的起源与演变，这些被语言科学排除掉的维度，比较文学不仅不能同样“精简”之，反倒要逐一重新容纳进来，由是，比较文学非但不会形成“所有文学创作与经验的整体意识”<sup>[67]</sup>，相反，它在向不同文明传统和文化实践开放的同时将想象中的“文学本身”的稳定边界击碎了。这也是韦勒克所推助的最大吊诡：他投注了巨大精力去建设的比较文学，却是瓦解文学之为整体的最显要力量，无怪乎霍奎斯特认为他属于最后一代将文学视为整体对象的学者<sup>[68]</sup>。正是韦勒克自己打开了文学边界的闸门，之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很快促使文学迅速向其他学科进发，扩散为文化研究熔炉的一部分。

[本文系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现代人文主义语文学与比较文学关系研究”(2022ZWY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46][48][49][68] Michael Holquist, "Remembering René Wellek", *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 vol.7, no.2-3(2010), pp.163-164, pp.166-167, p.164, p.169, p.166.

[2][5][31][32][38][39][40][53][59][61] René Wellek,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Werner Friederich ed.,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ICLA*,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9, vol.1, pp.149-159, pp.155-156, pp.158-159, p.157, p.156, p.156, p.156, p.159, p.158, p.158.

[3] 述及《危机》的论著繁多，此不赘列。国内有关韦勒克学术的整体性研究，可参见支宇《文学批评的批评——韦勒克文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15][67] Wellek, "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Stephen Nichols, Jr. and Richard Vowles (eds.), *Comparatists at Work: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altham: Blaisdell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p.22, p.20, p.13.

[6][10][30][56][57]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third edition, New York: Harcourt, 1956, pp.15-19, p.38, p.51, p.53, p.52.

- [7][8][16] Wellek,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General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2.3(1948), p.218, pp.215-216, p.217.
- [11] Wellek, "How, Why and When I became a Comparatist?" in Erwin Koppen et al. (eds.), *Wege zur Komparatistik*, 1983, pp.159-160.
- [12][13][14][17][18] Wellek, "American Literary Scholarship", in Stephen G. Nichols, Jr. (ed.),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296-315, pp.299-301, p.301, pp.301-303, pp.310-311.
- [19][21][34][35][36][41][42][47] Warren and Wellek,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n the Graduate School: Diagnosis and Prescription", *The Sewanee Review*, vol.55, no.4(1947), pp.610-614, pp.614-615, pp.623-624, p.624, p.625, pp.623-625, p.626, p.614. "国族" (nation) 这一概念关涉种族、国家和相关共同体塑造的复杂运作与历史演变, "national literature" 一般译作"民族文学", 本文指涉其在现代文学学科体制中的实存时称"国族文学", 以兼具族与国两项意涵。
- [20] *OED*, second edition, s.v. "crisis".
- [22] 参见郭西安《批评或投射: 韦勒克对两种语文学路线的反思》, 《海峡人文学刊》2022年第4期。
- [23] 韦勒克也主张"透视主义", 但与奥尔巴赫显著不同, 他更注重动态、过程与整体的辩证, 强调批评和理论的当下介入与自省。参见陈菱《"透视论": 一种经验性的阐释理论》, 《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 [24] Wellek, "Auerbach's Special Realism", *The Kenyon Review*, 16.2(1954), p.306.
- [25] Wellek, "Auerbach and Vico", *Lettere Italiane*, 30.4 (1978), p.467.
- [26][27][28] Wellek, "Leo Spitzer(1887-1960)",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2.4(1960): p.330, p.325, pp.329-330.
- [29][58] David Damrosch, *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 Literary Studies in a Global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31-32, p.94.
- [33] Wellek, "The Revolt against Positivism in Recent European Literary Scholarship", in *Concepts of Criticism*, p.281.
- [37] Werner Friederich, "Our Common Purpose",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4(1955), p.57.
- [43][44][50][51] Wellek,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7.4(1965), p.336, p.336,

- p.326, pp.332-334. 有关人文主义作为比较文学核心议题的论述, 参见陈思和《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之精神基础——论勒内·艾田伯的“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李清良、戴诗成《比较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外文化与文论》2014年第2期)。
- [45] Wellek, "Memories of Profession", in Lionel Gossman and Mihai I Spariosu (eds.), *Building a Profession: Autobiograph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Beginning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pp.1-12. Martin Bucco, *René Wellek*,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1, pp.17-26.
- [52] 韦勒克多次表明, 比较不是狭义的对比异同, 而关涉参鉴、对照、审辨等诸种判断行为, 其核心在于多元可能性的敞开与对话。
- [54] Wellek, "The Concep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2(1953), p.5.
- [55]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37.
- [60][65] Wellek, "The Parallelism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in W.K. Wimsatt ed., *Literary Criticism-Idea and Act: The English Institute, 1939-1972, Selected Essay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p.63-65, p.64.
- [62] 金惠敏的分析为我们理解韦勒克理论在实践中遭遇的反讽提供了生动例证, 参见其《"文学性"理论与"政治性"挪用——对韦勒克模式之中国接受的一个批判性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 [63]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Payot, 1971, p.13.
- [64] Calvert Watkins, "What is Philolog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7.1(1990), pp.21-25; Émile Benveniste, "Lettres de Ferdinand de Saussure à Antoine Meillet", *Cah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 21(1964), p.95.
- [66] Hun Sauss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Next Ten Years", in Ursula K. Heise (ed.), *Futur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CLA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Report*, Routledge, 2017, pp.27-28.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吴子林